西北方言史断代

(美)柯蔚南 著　邓晓玲 译

【摘　　要】本文介绍西北方言历史的演变过程,并以此历史过程加以断代。所讨论的年代,由汉末三国开始,至现代为止。地域主要包括陕西南部的关中平原,以及甘肃走廊。断代系统基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现有文献资料,并着重讨论材料中最为明晰的那些历史时期。由于词汇和句法方面的材料较为缺乏,乃以声韵演变为断代之标准,划分出七个历史阶段:一、前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280年左右);二、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400年左右);三、隋唐长安阶段(公元580-650年);四、盛唐长安与盛唐沙洲阶段(公元700-800年);五、晚唐长安与沙洲阶段(公元800-1000年);六、后沙洲阶段(公元12世纪);七、现代方言阶段。

【关 键 词】西北;汉语;方言史;断代

【作者简介】柯蔚南(W. South Coblin,1944-),男,美国人,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历史音韵学、汉语早期方言文献、汉藏语比较及历史语言学研究(美国 爱荷华 52242-5500)。

【译者简介】邓晓玲(1983-),女,河南孟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历史语言学、语言人类学研究(山东 威海 264209)。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3.1.73~80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数据库的畲话分类问题研究"(15YJC740011)。

一、引言

语言史断代研究需要参照现有的材料。历史上"重要"时期的断定往往都需有据(文献)可依。否则,我们无法获知当时的语言特点,也就无法开展此类工作。这里所提及的文献证据,可以是完整的音系、语法、词汇材料等,也可以是零碎的注解、进入其他语言中的或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等等(后者仅能告知我们消亡语言的某些局部特征)。

汉语语言学史(相对于史前史)实际上是方言史,汉人至少从青铜时代以来就说这些方言。它们中有些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及政治地位,有些则不然,但它们共同构成了演进中的汉语语言学史。华夏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十分久远,但汉语书面语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真实的方言口语,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前者对后者的反映程度可能会因时间、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另外,书面语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或者曾经反映了真实的方言音系,也同样难以判断。

在汉语西北方言史上,反映前现代时期(premodern)的音系、语法及词汇等全套内容的材料虽间或可得,但通常甚为罕见,因为大部分的材料仅涉及音系。从地理上来看,历史术语"西北"所涵盖的地域至少应包括陕西南部的"关中"地区以及甘肃走廊,并且也很有可能包括被现代方言学家称之为"晋"的山西地区。该研究主要讨论前者(关中地区和甘肃走廊),后者固然重要,但该研究仅简单介绍其在西北语言史中的作用。先前的研究已对前者的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概述。[①]我们在此仅指出一点:尽管关中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开始讲汉语,但甘肃走廊地区直至西汉才开始受到汉人的政治统治。因此,我们推断,上述两地同时持续或多或少受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到汉语影响的这种情形，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

二、最早的阶段

我们将以公元400年为切入点来展开西北方言史的断代工作。4世纪中叶，位于关中地区的长安城相继成为两个外族王朝前秦(351-394)和后秦(384-417)的都城。这一时期，关中佛教文化十分兴盛，经甘肃走廊向西传播至中亚腹地。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也在这个西北佛教的“黄金时代”应运而生，随之出现了我们感兴趣的梵汉对音材料。这部分材料代表着我们所关注的两个重要的次方言。鸠摩罗什(Kumārajīva)的大量译本对应关中地区。这部分译本产生的时间大概在公元400年后不久，地点在长安。相关讨论详见*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2]。另外，至少有两类对音材料对应甘肃走廊地区。一类是4世纪末的佛陀耶舍(Buddhayaśas)对音材料和竺佛念对音材料。这些材料已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过[3]。另一类是随后不久(约公元420年)出现的昙无谶(Dharmakṣema)对音材料，亦在*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中有所述及[4]。总之，这些可能是最早详细记录前现代时期西北方言音系的资料。因此，我们暂且将该时期称为“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

对于“古代西北话阶段”以前的时期，我们有出自竺法护译本的对音材料。竺法护(Dharmarakṣa)于公元230年左右出生在敦煌的一个世居家族—月氏家族[5]，他的大部分翻译工作似乎都是在3世纪80年代(280´s)完成的，他从业于长安和甘肃走廊各地，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其作品中的对音用例仅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对音用例经柯蔚南考察并收录[6]。至少就目前而言，这个时期也许是拥有早期西北方言可靠对音材料的最早的阶段。我们称其为“前古代西北话阶段”(Pre-ONWC)。

汉代中期出现了另一批对音材料，并非僧人所著。蒲立本(尤其是1962年的一项著述[7])作过介绍，因而人们并不陌生。我们最近为这批材料做了索引，并在一篇未刊稿中述评了若干相关的问题[8]。该批材料中的一些汉代用例也许出自西北。除此之外，我们尚未发现有进一步论述甘肃走廊地区方言的材料。同时期，关中诗人也撰写了一批诗歌韵文资料，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以当时的地域方音为基础创作的(参见柯蔚南相关研究[9])。较汉代中期更早的阶段，有一批来自古秦地的金石资料(paleographic data)可能与当前研究相关。此处主要指的是云梦墓(秦时期)出土文献中的及东周秦国青铜器铭文中的“假借”材料。韵文和假借材料可能都以某种方式反映了西北方言音系极为早期的面貌，但在我们看来，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类型的资料是否一定可用于上述时期音系的实际构拟。因此，是否可将其纳入该断代系统也是无法确定的。但如果执意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借鉴考古学领域的术语，称这种类型的材料代表了“前古代西北话阶段”之前的那个时期(Archaic Northwest phase[10])。

三、中古阶段

1.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之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材料几乎全都来自关中地区。此期第一个主要阶段(包括6世纪后半叶和7世纪前半叶)以两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为代表。第一种是可能出自6世纪后半叶长安地区的阇那崛多(Jñānagupta)对音材料。尉迟治平[11]、柯蔚南[12]最近对此进行了讨论。早期水谷真城[13]、蒲立本[14]也围绕这些材料展开过专门的研究。第二种是颜师古(581-645)《汉书音义》(成书于公元641年)注解中的反切和直音材料。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以同时期的长安方言音系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相较于阇那崛多的对音材料(第一种材料)而言，第二种材料可能代表着稍晚期的语言变化。大岛正二[15]、董忠司[16]及钟兆华[17]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研究通过严密的内部分析和比较，揭示了有关反切基础音系的大量信息。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一小部分7世纪的“藏汉对音”及“汉藏对音”材料。其中有些肯定至少可追溯到约公元65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年或稍早时期，故而这些对音材料同颜师古的材料属同一时期。以上所有这些材料代表的是“隋唐长安阶段”(STCA)。从“古代西北话阶段”(ONWC)到“隋唐长安阶段”(STCA)的过渡是以某些明显的音系变化为标志的。声母中，双唇塞音(bilabial stops)在元音*u前变为唇齿音，舌尖塞音(dental stops)中开始出现一种带有卷舌音特征的新的塞音系列。韵母中，止摄内部广为合并，一等东、冬两韵已完全合二为一。

2.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时间上基本与8世纪重合，我们称之为“盛唐长安阶段”(MTCA)。这一时期主要的材料来源是不空[金刚](Amoghavajra)的对音材料。不空[金刚](公元705-774年)是一个印度僧人，他后半生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都是在西北地区(长安城或其附近)度过的。Maspero的知名研究[18]以及最近刘广和的两篇文章[19]讨论过他的对音材料。参阅柯蔚南相关著述[20]。另外，我们也可将若干8世纪以来的藏汉及汉藏对音材料划归在这个阶段。从“隋唐长安阶段”(STCA)到“盛唐长安阶段”(MTCA)的转变是以*m-的轻唇化(dentilabialization)，以及鼻音声母部分语音特征的转变为标志的。*m-的轻唇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并且这种条件早期也曾影响到双唇塞音。鼻音声母转变为通常所谓的“鼻冠浊塞音”(prenasalized voiced stops)或者“后塞鼻音”(post-stopped nasals)之类的音，也就是所谓的“唐代去鼻音化”(Tang denasalization[21])。这个时期的韵母以许多语境中出现的*-u到*-eu，*-iu到*-ieu的变化，以及早期*-ø(传统上所谓的yu鱼韵)到*-y的转变为标志。

“盛唐长安阶段”(MTCA)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即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现代对该著述的主要研究是《慧琳一切经音义考》[22]。慧琳其人生卒年不详。我们暂且采纳周法高的观点，认为他生于公元737年，卒于公元820年，于公元783年至公元810年期间编写了《一切经音义》[23]。其为不空[金刚]的弟子，是来自喀什噶尔地区的中亚人(有报告称)。不过也有消息来源说他是关中本地人。大概前者指的是他的祖籍，而后者反映了他实际的居住地。慧琳在长安完成了《一切经音义》。景审为之作序，序言中特别提及：慧琳的反切基于同时代的西北(即“秦”)方言，且其出自两部更早期的著述，即《韵英》(大概成书于约公元750年)和《考声切韵》(大概是7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完成的)。我们无法完全肯定慧琳实际在多大程度上依照了以上这些早期研究[2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的《一切经音义》反映的语言年代可能早于他生活的年代。使用山田孝雄的《一切经音义索引》[25]，我们逐条目考察慧琳的材料，发现有不一致的情况。这可能揭示出“材料本身是有层次的”这个事实。并且在我们看来，应该带着这个特别的疑问来重新审查整个材料。总之，按照时间顺序，《一切经音义》应该涵盖了整个“盛唐长安阶段”(MTCA)，或许实际上也可向前延展至“隋唐长安阶段”(STCA)的后半段。

3.人们普遍认为，“821-822年唐蕃会盟碑”中的对音用例反映了9世纪的长安方言音系。高田时雄已将这部分内容收集整理为便于我们使用的材料。[26]“821-822年唐蕃会盟碑”的完整版本及相关研究，见*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27]及*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28]。该时期可划归为晚唐长安(LTCA)阶段。从“盛唐长安阶段”(MTCA)到该阶段的转变以浊擦音清化及多种元音的变化为特征。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没有了传统音韵学术语所谓“重纽”的区别。

至于同期及略晚的一段时期，甘肃走廊地区有着相当丰富的材料。它们主要是用藏文对音转写的，也有极少部分采用的是婆罗米文(Brāhmī scripts)。这部分材料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其时间跨度大概是从9世纪到11世纪。学界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了解到相当多的这类材料(虽然绝非全部)，并进行了十分广泛的研究。其中，高田时雄的著作(现已全套刊出)涵盖了最新且最丰富的资料。[29]关于全套婆罗米材料的专门研究，也可参阅高田时雄的相关文章[30]，亦可比较Emmerick和蒲立本的研究[31]。有一个例外是藏文圣彼得堡中国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妙法莲华经》,高田时雄分别在另外两篇文章中讨论过[32]。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即《伦敦长卷》,这是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资料室收藏的一部宏大且复杂的资料,最近刊出的高田时雄的文章对这部写本进行了音译和分析[33]。因此,据我们了解,迄今为止,仅剩下一些零星的材料还未发表。

上述材料代表着若干不同的汉语方言,我们将它们称之为"沙洲方言"(沙洲是敦煌地区早期的中文名称)。高田时雄喜欢用"河西"这个术语。这些方言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至少两个阶段,早期阶段明显保留着古老的浊的塞音和塞擦音(old voiced stops and affricates),而到了晚期,浊的特征(voicing)似乎已经消失。这两个阶段可称为"早期沙洲"(Early Shazhou)和"晚期沙洲"(Late Shazhou)。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命名是类型学的,而非年代学的。我们无法知晓"有浊音的方言"和"无浊音的方言"是否同时存在过,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因为大部分写本代表的有可能是汉字的文读音,而非口语音。它们是对现存文献的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转写。[34]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例外。其中之一是一系列"口语手册",它们可能是进入到甘肃走廊汉语区的藏人和于阗人(Khotanese)所使用的实用语言手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记录着那个时代真实的西北汉语口语。我们将这种口语称为"沙洲白话"(Colloquial Shazhou),以区别于文读音。第二种类型的口语材料来自《伦敦长卷》(正面页117-173行)。这类材料似乎是涉及各种佛教术语及概念的讲经记录。[35]它包含大量句末虚词,也展现了有趣的形态音位变化(morphophonemic processes)[36],可能代表着一种正式的或"讲经风格"的沙洲白话。正是因为同时享有这些拼音文字记录的真实口语材料(vernacular texts),我们的"沙洲研究"资料才显得异常丰富。这使得我们有可能直接研究这些具有千年历史的方言的音系、语法及词汇系统。这种情况在汉语历史方言学领域是极为罕见的[37]。

沙洲方言音系的比较研究构拟出了所谓的"共同沙洲"(Common Shazhou(CSZ))—— 一种假定的沙洲方言祖语(the putative ancestral prototype)。由于沙洲方言之间明显具有非常相近的关系,所以CSZ阶段与上述8世纪的MTCA阶段,事实上可能属同一时期。[38]有时,我们甚至也有可能推测出沙洲方言史更为早期的阶段,并将其(这类构拟)称为"前沙洲"(pre-Shazhou)。

除了对音材料,我们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沙洲方言音系资料,即敦煌地区各种口语文学作品中的别字异文。它们是用于确定沙洲时期音类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就此展开的一项主要研究是《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39]。许多这类材料尚待研究,值得进一步关注。别字异文材料有时反映方言差异,这些差异我们在对音材料中亦可观察到。例如,在某些材料中,所谓的"鱼"yu韵(切韵系统[QYS]中的-jwo韵母,这里引用的是高本汉先生的观点)可以和虞韵(高本汉-ju)自由替换。然而在其他材料中,它似乎与传统止摄类韵母同音(可能这个时期沙洲白话中全都是*-i)。在某些对音材料中也可观察到类似的方言差异,有些把"鱼"yu写成了藏语的-u或者-yu,而另一些则将其拼写为-i或者-e。有趣的是,我们在敦煌韵文文献中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40]

最后,另外一种类型的沙洲材料也许尤其需要注意。即鸠摩罗什(Kumārajīva)中文版《金刚经》(Vajracchedikā)的婆罗米对音材料。陈国在其文章中曾假设,这个材料是已失传原书的晚期复本,包含了某些书写变体。[41]因此,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反映出所谓的舌上(QYS ṭ-,等)和照三组声母(QYS tś-,等)的区别,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忽略或者模糊了这种区别。陈国还提到,早期区别特征的保留可能是原书的一个特征,而这种特征在晚期复本制作时被抹消了。[42]有趣的是,区别特征的留存是我们所谓的MTCA时期的一个特点,而两种声类的合并则是沙洲方言的一个特征,就像别字异文材料和对音材料中所反映的那样。假设《金刚经》的婆罗米对音材料反映了一种沙洲方言(这种假设显得似乎很有可能。高田时雄也在材料中发现了其他一些同陈国的假设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相一致的特点),那么它可能横跨了语言史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原书的那个时期,也许与MTCA同期,第二个时期即沙洲时代本身。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早期阶段[43]则可以被称为“盛唐沙洲”(MTSZ)[44]。

对于中世纪晚期而言,我们有12世纪西夏语(Tangut)对音材料中的西北方言材料。相关研究主要包括龚煌城的几项著述[45]。另见王洪君的两项成果[46]。这些西北方言材料处理起来相当困难,我们必须以构拟的西夏语(Tangut)音系为媒介来对其进行考察。就像王洪君所指出的那样,这些西北方言材料究竟代表着甘肃走廊地区的方言,还是与现代晋方言的联系更为直接,依然尚待确定。[47]我们暂且将这些对音材料所反映的语言称为“后沙州”(Post-Shazhou)。

四、现代方言阶段

再往下,跳过大约六七个世纪,我们直接到了现代方言。目前,关于兰州、敦煌、西宁现代走廊地区方言,以及乌鲁木齐回回方言的长篇著述颇丰,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文章。另外需要提到的是《甘肃方言概况》,它对大量方言作了简要介绍。[48]关中地区,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尚未有方言志出版。多项研究已充分报导了西安方言音系。另外,也有针对整个地区的音系调查。[49]关于晋方言,方言志调查报告为数众多,且数量稳步增加。新近又出现了专门讨论山西省内晋方言的一本专著。[50]

关中地区	甘肃走廊地区
第一阶段 前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280年左右)	
竺法护对音材料	
第二阶段 古代西北话阶段(公元400年左右)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对音材	佛陀耶舍(Buddhayaśas)和竺佛念对音材料 昙无谶(Dharmakṣema)对音材料
第三阶段 隋唐长安阶段(公元580-650年)	
阇那崛多(Jñānagupta)对音材料颜师古*反切*	
第四阶段 盛唐长安阶段(公元700-800年)	**盛唐沙洲[52]阶段(?)**
不空[金刚](Amtoghavajra)对音材料慧琳《一切经音义》	《金刚经》(Vajracchedikā)的婆罗米文(Brāhmī) 对音材料(最古老的部分)
第五阶段 晚唐长安阶段(约公元820年)	**沙洲阶段(公元800-1000年)**
“821-822年唐蕃会盟碑”	藏文和婆罗米文对音材料 别字异文材料 [诗歌韵文资料]
第六阶段 后沙洲阶段(公元12世纪[53])	
	西夏语(Tangut)对音材料
第七阶段 现代方言阶段	
关中方言	甘肃走廊方言

现代走廊地区方言所显现出的某些音系特征,似乎让人联想到沙州方言,并且它的有些词汇也可能是从沙洲时期留存下来的。但总体来看,它的前身似乎并不是沙洲话,而是后来进入该地区的中原人所讲的话。[51]它与中世纪方言的偶然相似可能是底层现象,也可能仅仅是某些情况下的偶然相似。另一方面,对晋方言白话层的深入研究表明,这些语言可能源于一种与古代沙州方言极为相似的古代方言。最终,我们可能会发现,沙州和晋实际上是由“古秦晋方言”(the old Qin-Jin complex)演化而来的姐妹方言。这个“古秦晋方言”是研究杨雄《方言》地理术语的学者所假定的汉代的方言名称。[54]因此,基于晋方言白话词汇层面的古代晋语音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系的构拟,有望成为未来西北方言历史比较研究中成果丰硕的领域。

文末附上相关表格,对所述西北方言史断代系统作简要概括。表格依地理分布分关中地区和走廊地区两栏,并列出了前现代时期主要的资料集。

译者按:英文原文初稿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研讨会(1994年2月)上宣读,终稿刊于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27卷,1期(1999年1月),104-119页。经作者及原出版社授权,翻译成中文在《长江学术》发表,中英文摘要为原文所附,中英文关键词为译者所加。翻译过程中得到柯蔚南教授的指导及张美兰教授、史皓元教授的帮助,匿名评审专家亦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1994a.[Chapter 1]

②④COBLIN, W. South.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1991, 8-9, 9-10.

③COBLIN, W. South."Remarks on Some Early Buddhist Transcriptional Data from Northwest China". Monumenta Serica 42. 1994b, 151-169.

⑤ZÜRCHER, E.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Leiden. 1959, 23, 65-70.

⑥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1994a.

⑦PULLEYBLANK, E. G."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 AM (n. s.) 9. 1962, 58-144. Part II: AM (n. s.) 9. 1962, 206-265.

⑧COBLIN, W. South. Ms(手稿)."Beyond BTD: an Excursion in Han Phonology". Unpublished.

⑨ COBLIN, W. South."The Rimes of Chang-an in Middle Han Times. Part I: The Late Western Han Period". Acta Orientalia (Copenhagen)47. 1986, 93-131; COBLIN, W. South."The Rimes of Chang-an in Middle Hart Times. Part II: The Early Eastern Hart Period". Acta Orientalia (Copenhagen)48. 1987, 89-110.

⑩译者按:此处的"Archaic Northwest phase"指的是比"Pre-ONWC"更早的时期。

⑪尉迟治平:《周隋长安方音初探》,《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兼答刘广和同志》,《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译者按:原文将作者姓氏译为"蔚迟",此处修正如上)。

⑫COBLIN, W. South.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1991, 5-7; 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1994a.

⑬MIZUTANI, Shinjō 水谷真城. "Bongo 'sorishita' boon o arawasu kanji"梵语"ソリ舌"母音を表わす汉字. Gengō kenkyū 37.1 960, 45-55.

⑭PULLEYBLANK, E. G."The Transcription of Sanskrit k and kh in Chinese " AM 11. 1965, 199-210.

⑮ŌSHIMA, Shōji 大岛正二. "Gan Shiko Kanjo ongi no kenkyū"颜师古汉书音义の研究 Hokkaidō Daigaku Bungaku kiyō 北海道大学纪要[Part I]17(1969), 45-238;[Part II]19(1971), 3-85;ŌSHIMA, Shōji 大岛正二. "Gan Shiko Kanjo ongi inrui kō"颜师古汉书音义韵类考. Gengo kenkylu 59.1971, 43-61.

⑯董忠司:《颜师古所作音切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8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⑰钟兆华:《颜师古反切考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6-51页。

⑱MASPERO, Henri."Le dialect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20. 1920, 1-124.

⑲刘广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刘广和:《唐朝不空和尚梵汉对音字谱》,《开篇:中国语学研究》1993年第11卷,第7-15页。

⑳COBLIN, W. South.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4. Berkeley. 1991, 4; 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1994a.

㉑译者按:此处的"Tang denasalization"指的是唐代标准关中方言鼻音声母变成鼻冠音。《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将"denasalization"译为"非鼻音化"。见〔英〕R. L. 特拉斯克编,《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编译组译:《语音学与音系学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㉒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考》,上海、北平:中央研究院1931年版。

㉓㉔周法高:《玄应反切字表(附玄应反切考)》,香港:崇基书店1968年版,第202-203、204页。

㉕YAMADA, Yoshio山田孝雄. Issaikyō ongi sakuin一切经音义索引. Tokyo. 1963.

㉖TAKATA, Tokio高田时雄. Tonkō shityō ni yoru Chōgokugo shi no kenkyū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 Tokyo. 1988, 294-297.

㉗RICHARDSON, H. E.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tford, 1985.

㉘LI, F. K., and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91. Taipei. 1987.

㉙TAKATA, Tokio高田时雄. Tonkō shiryō ni yoru Chōgokugo shi no kenkyū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 Tokyo. 1988.

㉚TAKATA, Tokio高田时雄. "Kōtan monjojū no Kango go-i"コータン文书中の汉语语汇. In Kangoshi no shomondai汉语史の诸问题. Kyoto. 1988bis, 71-128.

㉛EMMERICK, Ronald, and E. G. PULLEYBLANK. 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Roma. 1993(1994).[Actually appeared in 1994]

㉜TAKATA, Tokio高田时雄. "Leningrad ni aru Chibetto moji tensha Hōkakyō fumonhon"レニングラードにあるチベツト文字转写法华经普门品. (Pans I and II). Kobeshi gaigokugo daigaku gaigokugaku kenkyū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23, 1990, 1-34; 24, 1991, 13-41. (译者按:原文为"レニングラードにある文字转写法华经普门品",此处修正如上。)

㉝TAKATA, Tokio高田时雄. "Chibetto moji shosha 'Chōken' no kenkyū(hombun hen)"チベット文字书写「长卷」の研究(本文编). Tōhō gakuhō东方学报1993, 65.3.380-313[pagination reversed in the original].

㉞译者按:这些藏文写本大部分是将汉语原文转写为藏文。

㉟译者按:"讲经记录"指的是听人讲经时所作的笔记。

㊱译者按:例如"变调",福州话里有很多这种现象。

㊲译者按:这里指的是,因研究材料十分丰富,故我们对这些方言的研究可不必局限于音系,亦可涉及其语法及词汇系统。但这种情况在汉语历史方言学领域并不多见。例如,因为材料的原因,我们较易研究汉朝的语音系统,而不易研究其口语语法及词汇系统:相反,我们较易研究《祖堂集》的词汇、语法系统,而不易研究其语音系统。

㊳译者按:如若用于比较的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关系极为相近,那么它们从祖语或祖方言分离出来的时间大概不会太久远。所以,CSZ(共同沙洲)阶段与上述8世纪MTCA(盛唐长安)阶段,可能是同一时期。

㊴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

㊵PULLEYBLANK, E. G. Middle Chinese. Vancouver. 1984, 109.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㊶CSONGOR, B."A Chinese Buddhist Text in brāhmī Script". Unicorn 10. 1972, 36-77. [67-68]

㊷译者按:早期原书中舌上(QYS ṭ-,等)可能和照三组声母(QYS tś-,等)界限分明,但晚期复本中二者边界已模糊。这大概是因为,晚期这两种音在口语中已经混合,所以人们在传抄原书时未能将其完全区别开来。

㊸译者按:"早期阶段"指的是上述"第一个时期"。

㊹译者按:"盛唐长安"(MTCA)方言同"盛唐沙洲"(MTSZ)方言所属时间相同(盛唐时期),分布地域不同。

㊺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声母部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81年第52本(第1分),第37-78页;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韵尾问题)》,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语言与文字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45-190页;龚煌城:《十二世纪末汉语西北方音韵母系统的构拟》,手稿。

㊻㊼王洪君:《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王洪君:《文白异读与迭置式音变》,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语言学论丛》1992年第17辑。

㊽甘肃师大中文系方言调查室:《甘肃方言概况》,1960年内部印行。

㊾白涤洲:《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

㊿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

51TAKATA,Tokio高田时雄. Tonkō shiryō ni yoru Chōgokugo shi no kenkyū 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 Tokyo. 1988, 7-8; COBLIN, W. South. A Compendium of Phoneties in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7. Berkeley. 1994a.[Chapter 5]

52译者按:原文中文摘要中,"Mid-Tang Shazhou"译为"前沙洲"。但文中"前沙洲"为"pre-Shazhou"。故此处修正如上。中文摘要一并改之。

53译者按:原文中文摘要中,"twelfth century"译为"公元1200年左右"。此处修正如上。中文摘要一并改之。

54SERRUYS, Paul L-M.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rt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Berkeley. 1959.

Periodization in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USA) W. South Coblin

Abstract: This paper suggests a periodization scheme for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from the immediate post-Han period to the pres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discussion, the northwest area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sub-regions, i. e. the Guanzhong plain of southern Shanxi and the Gansu corridor. The scheme is of necessity built around available textual materials from successive historical periods, emphasizing those stages which appear most clearly in the sources. It takes as its basis phonology rather than syntax or lexicon, since the latter two areas are not well represented in pre-modern texts. The suggested periodization consists of seven stages, i. e. Stage I. Pre-Old Northwest Chinese (ca. 280 A. D.), Stage II. Old Northwest Chinese (ca. 400), Stage III. Sui-Tang Chang´an(580-650), Stage IV. Mid-Tang Chang´an and Mid-Tang Shazhou (700-800), Stage V. Late Tang Chang´an and Shazhou proper(800-1000), Stage VI. Post-Shazhou (twelfth century), and Stage VII. the Modern Period.

Key words: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history; periodiz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